

# 近 20 年 《江村经济》 对英语学界的影响

周 云，彭书婷<sup>①</sup>

**摘 要：**2016 年正值费孝通的巨作《江村经济》依据的调查开展 80 周年。这一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光辉，使其在时隔近 80 年后依然启发着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通过对近 20 年内引用《江村经济》典型英文文献的分析，发现此著作绵延的学术影响力。其开创的本土化研究及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其在 80 后仍在多地区、多领域产生持续影响的原因。

**关键词：**《江村经济》；费孝通；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 (2017) 01-0009-08

## 一、研究背景及思路

《江村经济》1939 年在英国出版后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sup>①</sup> 它首先以英文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中文版本出版则是在近 50 年之后的 1986 年。1986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中文版，之后又有中华书局（1987 年）、商务印书馆（2001 年、200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2013 年中英文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等多个单位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江村经济》。这一著作因此不仅对海外，也对国内的学人乃至普通百姓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人类学、社会学著作的素材，来自费孝通 1936 年夏天在吴江县开弦弓村所做的田野调查。2016 年是江村调查 80 周年，80 年对一个人来说已是高寿。而对一部学术专著，80 年又意味着什么？

### （一）研究内容的确定

《江村经济》自发表以来，已有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有中文也有外文。根据对国内文献的把握，目前我们还缺少对国外研究中引用或利用《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开展各自学术研究这一角度的分析，对《江村经济》发表近 80 年来，人们是否依旧关注以及如何关注这一著作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从作者外语能力以及资料可及性考虑，本文将重点收集和分析英文出版物中《江村经济》的引用状况。

### （二）资料的收集、筛选与整理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自现有的文献，使得研究具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意义。文章根据 Scholar Google 所列，整理引用过“Peasant Life in China”的文献。我们在 Scholar Google 输入“Peasant Life in China”后，出现该著作有被引用过 409 次的记录。考虑到 2016 年这个时间节点、《江村经济》持续影响力以及研究可行性的问题，本研究将资料限定在 1995 年至今的文献。如此设定的理由是，1995 年费孝通先生 85 岁，是江村调查将近 60 个年头的时间点。1995 年至今也有 20 多年。考察这 20 年的引用内容，虽难以说明国外英文文献的全部引用状况，但可以从一个时间区段考察一种趋势，特别是《江村经济》在当前社会的持续影响力。

<sup>①</sup>作者简介：周 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书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北京，100871）

<sup>②</sup>以往出版的版本包括，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39;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9; 東京: 教材社, 昭和 14 [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江村经济》首次在海外出版时费孝通只有 29 岁。

根据上述时间和文献语言的原则再次搜索 Scholar Google, 从 1995 年至今, 有 272 项研究成果引用过《江村经济》。这些研究成果包括专著、编著、文章以及学位论文。本文的分析只包括了公开出版的英文书籍和文章, 未包括 Scholar Google 中列出的其他语种的文献 (如中文、日文等); 还因其含义不明, 剔除了标有“引用”符号的文章、硕士和博士论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没有明确出版信息的文献 (如仅提供网页的文献)。经过筛选后, 共得到带有所需重要出版信息的 157 条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成为本文重点分析的内容。

## 二、主要研究结果

本文针对 20 年多来《江村经济》在英文出版物中被引状况的分析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年代、作品类型、关注主题、作者身份以及区域的角度, 分析引用费孝通著作的一些特点 (表 1)。这一部分的分析可说明《江村经济》现实影响力的现状和趋势。第二部分则通过数个个案, 说明不同学者关注或引用《江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受限于文章的篇幅, 我们主要以在人类学相关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为例, 说明学者引用费孝通著作的初衷、形式和具体的内容, 并辅之以其他非人类学/社会学学科的个案, 以此发现《江村经济》对当代学者的影响角度与力度。

### (一) 数据资料的概括分析

从时间上看, 1995 至 2016 年近 22 年间, 公开发表、涉及《江村经济》的英文书籍和文章共有 157 篇, 每年平均为 7.09 篇。然而从年份上看, 超过每年 10 篇的年份为 2005、2013、2014、2015、2016; 其中 2005 年是费孝通去世的 1 年 (4 月), 其他年份则为最近几年。其中, 2016 年不到半年的出版物中就有 2 本书和 8 篇论文曾引用过费孝通的这一著作。由此可见, 近年来《江村经济》仍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此处将所收集的资料按不同类别的整理结果见表 1。

表 1: 20 年来《江村经济》在英文出版物中的被引特征

类别	数量	类别	数量
按发表年代分		按作品类型分	
1995~1999	18	书籍	43
2000~2004	31	文章	113
2005~2009	34	小计	156
2010~2014	53		
2015+	21		
小计	157		
按研究关注主题分		按作者身份分	
中国	106	国外学者	69
非中国	50	华人学者	44
小计	156	中国学者	42
		小计	155
按作者就职学校的地域分		按作品学科分	
美国	40	社会学	43
英国	22	人类学	37
中国		历史学	10
大陆	30	其他	67
香港	16	小计	157
台湾	6		
其他	43		
小计	157		

注: 因文献中所需信息缺失, 部分分类下的小计数小于分析总样本的 157。

从文献类型和内容上看, 近年来引用《江村经济》一书的多数作品为学术论文 (113 篇)、专著或编著著作, 其比例占到总体的 27%。大多数文献的研究主题是中国 (67.5%), 少数是在

讨论其他议题时联系到此书(31.8%)。文献跨越的学科则多达35个。若以作者所在院系作为所引作品的学科分类依据,则以社会学居多、人类学次之,两者在量上不相上下,分别占总文献的27.4%和23.6%。引用量排名第三的学科是历史学,其占比达到总引用量的6.4%。

这些英文出版物中的作者有国外学者,也有用英文发表文章的中国学者。国外学者中又可分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的外国学者两类。从作者本身特征和其所在区域考察,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占到26.8%,也就是文献的作者单位在中国(含香港和台湾)。排除无法判断机构特点的两篇文献,其余72%的文献作者均来自国外。但在这72%的海外作者中,华人学者的比例占到38.9%。华人学者的判断标准为其标明的单位为国外学术机构外加中国姓名。如此归类,可以免除判断作者国籍的问题。如果将华人学者和中国学者相加,则有54.8%的作者与中国有一定的关系。从地域上看,除中国之外,这些文献的作者分布在15个国家,但多在美国(25.5%)、英国(14.0%)、加拿大(5.7%)和澳大利亚(4.5%)。显示出费孝通《江村经济》对学界影响的区域特征。

## (二) 文献引用内容的个案分析

在引用《江村经济》学者的学科背景上,社会学最多。然而考虑到费孝通《江村经济》是基于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且费孝通在完成这一著作时更多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如史禄国、弗斯和马林诺夫斯基),我们将个案分析重点放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引用文章。为了排除一些学科属性有争议的杂志,此处仅从杂志名称中带有和人类学相关词语(如 American Anthropologist、Anthropology Today 和 Current Anthropology 等)的出版物中选择个案。在阅读相关文章过程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做细致研读,找出作者引用的原因和方式。除人类学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外,其他学科学者在非人类学杂志文章中对《江村经济》的引用,也是我们分析的一个焦点。通过几个个案(教育学、老年学和历史学的例子),说明《江村经济》的影响广度和深度。在分析人类学杂志文章中引用过《江村经济》的文章时我们发现,它们可归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类学议题型”,特别探讨人类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另外一种是“人物生平或传记型”,从不同角度讨论费孝通的一生。

### 1. “人类学议题型”

此类引用文章主要考虑文明问题以及书中经验研究的引用和借鉴作用,首先是文明问题。《江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中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学家从以外来者的身份研究简单社会向以本土学者的身份研究复杂文明社会的转变。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就在其2002年发表于《人类学批评》文章中指出,中国作为非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它是一个复杂的文明体,并以其广大的疆域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为其本土人类学家提供了“少数民族”这样内部的他者。费孝通这类本土人类学家对于本文化的研究本身,亦是对原本仅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人类学的创新与挑战。而在20世纪初,中国本土人类学的发展开始更朝向与政治和应用的方向,《江村经济》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提出了振兴民族工业这一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sup>①</sup>在王铭铭的文章中,《江村经济》被作为早期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里程碑式作品而被提出。说明此文对《江村经济》的引用所要突出的重点,在于言明其在人类学史上的标志性地位,以及其作为中国人类学的巨著对后来国内外学者的启发性作用。2012年《亚太人类学杂志》刊登了一组来自“帝国、文明与中国的人类学”会议上的特约稿件,其中梁永佳的文章似是一篇统领文章,说明了会议的初衷以及收录论文的简要说明和评论。<sup>②</sup>这篇论文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略有关系。作者在讨论文明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时认为,很多知名人类学家在事业早期多关注和研究微观社会,但在他们事业后期往往转向讨论更加宏大的议题。以费孝通为例,梁认为,他早年做社区民

<sup>①</sup>Wang, Mingming, “The Third Eye Towards a Critique of Nativist Anthropolog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 22, no. 2, 2002, pp. 149~174. 331页。

<sup>②</sup>Liang, Yongjia, “Civilisation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a”,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13, no. 2, 2012, pp. 105~111.

族志,事业后期开始关注3000年中华民族这一宏大的文明问题。用费孝通自《江村经济》开始的学术经历,说明“文明”一词统领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是梁永佳引用这一文献的主要目的。

第二是关于《江村经济》一书中经验研究的引用和借鉴。作为一部描写20世纪中叶中国农民生活图景的著作,《江村经济》书写的虽是80年前中国农村的景况,却至今仍为人类学理论和经验材料的丰富和延续提供着价值。首先是参考中国经验引用的两个案例。美国经济人类学家贝尔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对中国基于关系哲学下交换方式的研究论文中,三次引用到费孝通的著作,《江村经济》中对20世纪前期几种中国传统的婚姻形式的研究,则被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社会中关系类型的一种范例而被提出。<sup>①</sup> 作者认为,研究“上山婚”涉及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和对彩礼、嫁妆多少的定夺,有助于厘清彼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层级关系和交换方式。对此,《江村经济》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与论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系欧文森和谭克尔合写的发表于《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学》文章,虽然研究的是柬埔寨借贷体系,但引用了《江村经济》中关于中国传统信贷体系的内容,意在将其与柬埔寨信贷体系做比较。<sup>②</sup> 《江村经济》中对于中国传统信贷体系的描写,成为作者进行跨国研究时进行横向比较的资源。这也体现出,《江村经济》一书对于人类学界经验材料和理论范式的贡献。

有关对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经验借鉴这一类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文化人类学系的Liu Xin 2002年发表在《人类学批评》讨论中国“都市问题”的文章中,提到了有关于《江村经济》的内容。对于《江村经济》,该文仅在参考文献处有所涉及。但依文意推测,作者应是将其作为对乡土逻辑概括性的书目予以参考。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费孝通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为研究者使用的差异化作用。而《江村经济》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全貌的呈现,更是对研究者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sup>③</sup>

执教于东密歇根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犯罪学系的丰向红,在其2012年发表于《都市人类学、文化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杂志上的文章中,对《江村经济》中提出的通过振兴乡村工业来改善农民生活的发展途径做了讨论。费孝通所主张的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使农民脱贫,并辅以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的方式来复兴乡村经济的远见,正应和了作者的论点。<sup>④</sup> 汉拥有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的博士学位,现在马普研究院社会人类学所工作并任所长。他利用2006~2009年间在新疆哈密收集到的大量细致资料而撰写的文章中,试图说明社会主义可以为民众抵挡个人和集体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讨论哈密社区时,汉提到了费孝通,涉及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形容与讨论的长江流域农村地区的贫穷与不平等,以及农民脆弱性的问题。<sup>⑤</sup> 费孝通的研究为他提供了一个个案,以说明过去与现实中不同村落的人们经常面临的类似问题。

## 2. “传记型”

费孝通本人作为中国人类学先驱者的标签性作用,仍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而《江村经济》作为其博士论文及成名作品,是作者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此处引用的文章,主要在介绍费孝通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时提到《江村经济》一书,从而达到以作品反观作者的目的。

以费孝通生平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可举3例。例1为费孝通先生去世后,《美国人类学家》杂

<sup>①</sup>Bell, Duran, "Guanxi: A Nesting of Group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1, no. 1, 2000, pp. 132~138.

<sup>②</sup>Ovesen, Jan and Ing-Britt Trankell, "Symbiosis of microcredit and private moneylending in Cambodia".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15, no. 2, 2014, pp. 178~196.

<sup>③</sup>Liu, Xin, "Urban Anthropolog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 China",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 22, no. 2, 2002, pp. 109~132.

<sup>④</sup>Feng, Xianghong, "From labor to capital: Tourism and the poverty of resources in rural ethnic 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41, 2008, pp. 329~366.

<sup>⑤</sup>Hann, Chris, "The uncertain consequences of the socialist pursuit of certainty: The case of uighur Villagers in eastern Xinjiang, China" *Antipoda, Revista de Antropología y Arqueología*, vol. 17, 2013, pp. 79~105.

志于2006年在其108卷第2期上刊登的一篇悼念费孝通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欧达伟，历史系的荣休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费孝通被称为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特别说明，费孝通是因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而在西方社会著名。在这篇文章中，欧达伟对费孝通的生平做了介绍，当然少不了关注《江村经济》。有关《江村经济》，欧达伟对其做了一个简要的概述，称这本书的重点更多放在经济问题，包括农业、土地所有制以及农民的收入与支出，对这部著作的海内外影响也做了说明。<sup>①</sup>

费孝通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位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例2是摩根的文章。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教育学家摩根，是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分析费孝通跌宕起伏的一生，中间穿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摩根是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教育与公共政策、人与社会资本发展等。在刊登于《今日人类学》的一篇文章中，摩根认为，费孝通能够影响公众的基础，是他渊博的学识和痛苦或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影响的途径是他有关社会问题（如农村经济、小城镇、少数民族以及边疆发展）的通俗文章和著作、讲座和其他形式的宣传。获得并接受各种国际荣誉、受邀到国外讲学，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宣传个人理念的一种方式。无论他如何宣传，都离不开他学术研究和影响公众的主要目标。在这里，作者大段引用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的一些内容<sup>②</sup>并用书中的具体内容说明，费孝通坚持为大众服务一生努力的目标。

费孝通的一生，或多或少受到过国外知名人类学家的影响，例如史禄国。例3就是一个说明受他影响的例子。史禄国是俄罗斯人类学的先驱，因国家政权1917年的更替而一直留在中国，1939年在北京去世。俄罗斯人并没有因为这位人类学家在中国长达20年并在此去世而遗忘他。相反，在俄罗斯史、汉学、人类学、民族学、通古斯人-满族人、中国人以及萨满教研究学术群体中，人们始终对他怀有兴趣。“史禄国——一位人类学家的肖像”就是对他一生中一个侧面进行最新探讨的一篇论文，文章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作者是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sup>③</sup>文章通过史禄国1927~1932年在中国厦门、广州、昆明和北京与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sup>④</sup>之间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这位人类学家在那一段时间中的所思所想与所为。“所为”就包括了自1930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执教，创建中国的人类学专业，培养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类学家。文中写道“当费孝通前往剑桥大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时，他带去了在史禄国指导下收集的大量田野资料（开弦弓村）。”<sup>⑤</sup>正是这些资料促成了费孝通著名的《江村经济》的最终出版。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具体讨论《江村经济》中的内容，而且《江村经济》也是在史禄国去世之后或前后才出版，但正是史禄国对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最初指导与引路，才最终促成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著者前言<sup>⑥</sup>以及另外一篇文章<sup>⑦</sup>中，都提到史禄国对他的重要影响。尽管这篇文章不是专门研究费孝通的生平，但它通过俄国学者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贡献来说明费孝通《江村经济》成功的基础。

### 3. 其他类型

除上述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人类学议题型”和“传记型”的文章外，还有一些在不同

① Arkush, David R., “Fei Xiaotong [Hsiao-tung Fei] (1910~2005)”,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vol. 108, no. 2, 2006, pp. 452~456.

② Morgan, John W., “Fei Xiao Tong: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 Communist China” *Anthropology Today*, vol. 30, no. 6, 2014, pp. 18~21.

③ Sirina, Anna Anatolevna and Aleksey Aleksandrovich Zakurdaev, “Shirokogor off—a portrait of the anthropologist (from his letters to the sinologist Alekseev)”, *Asian Ethnicity*, vol. 17, no. 1, 2016, pp. 15~30.

④ 有关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可参见[俄]孟列夫《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及其汉学学派》，黄玫译，《国际汉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41~46页。

⑤ Sirina, Anna Anatolevna and Aleksey Aleksandrovich Zakurdaev, “Shirokogor off—a portrait of the anthropologist (from his letters to the sinologist Alekseev)”, *Asian Ethnicity*, vol. 17, no. 1, 2016, pp. 15~30.

⑥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⑦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读书》1994年第4期。

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过《江村经济》，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会给其他学科的学者带来怎样的学术启发或讨论？在此我们用3个例子来说明。

杜克大学护理学院和全球健康研究所的吴蓓，在她一篇有关在中国开展社区长期护理教学的文章中，也引用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篇文章发表在《老年学与老年医学教育》杂志。若仅看文章主题，我们很难理解长期护理教学与《江村经济》这一著作之间的关系。但若细读这篇论文，则可以发现，吴在讲述教学经历和教学策略时提到一个“局外人”和“权威”的问题。在讨论女性、年轻教师如何面对教学时，她引用了费孝通有关权威的观点。例如在中国社会，年长男性往往被看做是权威人物。<sup>①</sup>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她的女性身份和年龄促使她在教学中需做出更多的努力，以保证教学质量。《江村经济》中的相关论述给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带来了启发。

《江村经济》对教育学研究方法有所启发。投入至质性方法教学的中国教育学学者，对质性研究方法在国内外的的发展有清楚的认识，并不断反思在中国推广质性研究的途径。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任教的陈向明，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她在发表于《质性研究》杂志的文章中，深刻反思了在中国教授质性方法所面临的问题，并在教学中摸索出“知行合一”和“实践理性”两种策略。<sup>②</sup>在文章深入讨论教学问题之前，陈向明首先对质性研究在全球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说明。其中提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随着西方学者和传教士来中国做田野工作，这种方法开始在中国传播与应用。在她看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中国学生在外国学者指导下，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农村研究的一个个案。虽然全文未对《江村经济》的内容做深入探讨，但陈对费孝通所用的方法感兴趣；并认为，这是质性研究方法受西方学界影响、传入中国，并开始被采用的一个说明。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系的经济史学家芬安妮在研究中国清代扬州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时，引用《江村经济》作为其理论基础之一。她发表于《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期刊》的文章，主要研究清代扬州中产阶级对室内装修材料选择的历史材料，并发现在室内装修方面，扬州的中产阶级呈现出极为明显的自主选择和文化情趣，而并非完全受西方的影响。<sup>③</sup>作者是在开篇回顾研究中国19世纪左右民众的消费方式时提到《江村经济》，她将这本著作评价为，奠定研究中国的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领域基础的重要作品。可见，《江村经济》中论述19世纪中叶农民交换方式、消费观念、日常开支、协调自给与购买方式等内容，为历史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 三、相关讨论

文章至此，费孝通《江村经济》对学界的影响状况已经相对明朗。若从面上考虑，近2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仍在引用已有近80岁寿龄的《江村经济》。影响的学科，除主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之外，还涉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理科。若从英文文献中文章及作者特性的角度表述，多数文章关注的主题涉及中国。在国外作者中，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作者占主流；多数作者的学科背景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多数”之外，应该看到，文献作者跨越的学科有35个，涉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理科；跨越的海外国家为15个，充分说明了《江村经济》的学科以及国际影响力。

若从点上考虑，或者从独立文献的具体内容考察，我们发现，人们在社科领域的多个层面引

<sup>①</sup>Wu, Bei, "Teaching Chinese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bout community-based long-term care in China",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vol. 26, no. 1, 2005, pp. 137~179.

<sup>②</sup>Chen, Xiangming,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Teach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hina", *Qualitative Inquiry*, vol. 22, no. 2, 2016, pp. 72~86.

<sup>③</sup>Finnane, Antonia, "Chinese Domestic Interiors and 'Consumer Constraint' in Qing China: Evidence from Yangzhou",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57, no. 1, 2014, pp. 112~144.

用《江村经济》。针对人们为什么引用，以及怎样引用的人类学和非人类学/社会学的个案文献的深入分析可以说明，在人类学界，许多引述《江村经济》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人类学顶尖级杂志。作者有国外学者，也有中国学者。他们有人试图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开展对话。有人在思考宏大人类学议题时，回顾《江村经济》在人类学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或《江村经济》在费孝通学术生涯中的地位。也有人在专门研究费孝通生平时提到《江村经济》；或研究其他人类学家时，提到他们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影响。人类学/社会学之外的学者，也会受到费孝通的影响，这更能体现当今《江村经济》的影响力。有人运用《江村经济》中论述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来调整自己教学中的策略；或将《江村经济》放置在研究方法的发展潮流中，将其视作是质性研究方法在中国实践的先驱之例；亦有学者较看重《江村经济》中所论述的20世纪中叶中国农民从事交换活动的具体形式，并以之作为还原中国传统经济活动的重要史料。通过对所限定的个案文献的分析，我们依旧可以发现《江村经济》对学界的特殊影响。首先，费孝通本人作为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先驱，在国内人类学家这个群体中标志性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而《江村经济》作为其博士论文及成名之作，代表着作者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这种标杆性的价值，使其学术魅力在80年后的今天仍熠熠生辉。而由上文个案分析中“传记型”一项亦可见，费孝通本人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生产力，是其作品受到关注的一大原因。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所指出的，《江村经济》一书标志着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异文化和简单社会之上，而可转以本土学者的身份研究复杂的文明社会。<sup>①</sup>这是《江村经济》在整个人类学界的开创性价值，亦是费孝通本人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所开辟的新路。在地域间联系愈加广泛的今天，人类学家若仍以找寻和研究“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为所求，必定为时代所不容。所以，研究复杂的文明社会，研究本文化中的内部他者，已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而《江村经济》作为此类作品中的牵头者，其启发意义和讨论价值当然是可观的。再者，虽然如今中国农村的面貌已有所变化，但《江村经济》中对20世纪中叶中国农民生活图景的细致描写，仍使得其内容有横、纵两个方向的借鉴价值。以时间维度而论，书中对彼时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可为今日研究相关课题的学者所借鉴；以地域维度而论，书中所呈现的中国面貌，可为研究其他地区的学者提供比较的依据。另则，费孝通在书中所贡献的诸如“上山婚”一类的经典概念，亦是对人类学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充实。最后，今日中国农村虽已发生巨变，但其内部的乡土逻辑和遗留问题，仍与其百年前的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此，《江村经济》书中对彼时农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层级关系的梳理，以及以此为基础提出的振兴乡村工业以真正解放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远见卓识，对于学者分析今日中国农村面临的状况和发展的路径时，所具有参考和应用价值仍是十分可观的。而在本文的梳理中，这也是一些关心中国农村的民生和发展情况的学者所讨论的重点问题。

在个案文献引用状况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人们对《江村经济》的关注，已经从关心其具体的内容，转向更广的思考。对这种现状可有几点解释。一是《江村经济》描述的是80年前的一个中国村庄，与现在的研究焦点会有距离。如果我们翻查《江村经济》发表之后的前几十年，人类学学者对其的反应，可能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或许当时人们更关心的是《江村经济》中论述的远离欧美的中国农村当时的生活与经验。二是，费孝通一生的著作不限于《江村经济》。《江村经济》之后费孝通还出版过其他重要的学术著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其他著作的出现，学者对费孝通的关注点也在转移。也许人们在费孝通其他著作中，而不是在《江村经济》中，找到了更好的对话点。最后，由于这篇文章分析的重点是英文文献，且限定在人类学和其他相对于人类学/社会学中心较为“偏远”的学科，其结果可能与中文文献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别。摩根曾引用其他学者的话，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了解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家并不那么多，费

<sup>①</sup>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页。

孝通的学术影响力更多集中在中国学者中。<sup>①</sup>或许对中国学者引用费孝通《江村经济》的研究,会展现出另外一些特征。这也道出我们感受到的本研究的不足或缺憾——例如,没有深入考察最近20年《江村经济》给中国国内学者带来的影响,也没有特别分析国外社会学学者对《江村经济》的关注。

虽有此缺憾,本研究却不是一篇单纯的“文献回顾”,它更是通过文献来分析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学术影响力之作。它的作用,是从特定角度考察一位学者的学术观点及其学术著作在世界学术领域的健康存活力,特别是《江村经济》在80年后仍在多地区、多领域产生持续性影响的独特现象及其中原由。从宏观上看,通过对近20年来英文文献中学者对《江村经济》的引用情况的概述性和趋势性说明,本文以经验数据表明了此书在学界影响力范围之大,学科跨度之广。从微观上看,通过对具体引用文献的引用目的和引用内容的分析,本文细致展示了《江村经济》影响今日学者的具体角度和方面。这是一个以往未受到更多关注,却值得加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对这一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启发学者从多个视角去理解并挖掘这一著作的学术价值,发现与书相关,但未被足够关注和深入讨论的问题与方向。

此外,我们期望通过本研究促进中国学者在中文学界对《江村经济》研究的梳理和思考,努力在英语学界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推进中国和英语学界的沟通和交流,促使英语学界了解《江村经济》这类学术巨作在中国依旧产生影响原因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文所做的工作不仅限于分析一部著作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还有利于英语学界对中国人类学关心的问题、中国经验可被加以运用的角度有一个索引式的认识。总之,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学者充分利用以往重要学术研究、使其得以在现当代学术领域焕发新光彩;亦可让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不同地域以及学科领域中人类学著作的引用情况有大致的了解,从而推进人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并最终促进人类学学科本身朝着更具广度与深度的方向不断发展。

## Influence of Peasant life in China on English Academic Circle in Recent Twenty Years

ZHOU Yun , PENG Shuting

Abstract: It has been 80 years since Fei Xiaotong wrote *Peasant Life in China* at Kaixiangong village, where he was conducting his social investigation. Abounding in great thoughts, the book is still of high enlightening value to Chinese scholars and even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paper intends to demonstrate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the book by researching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has cited *Peasant Life in China* in recent 20 years and account for its continuous influence in many regions and fields 80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inspire other researchers to further discover the academic and research value of the book and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China and world.

**Keywords:** *Peasant Life in China*, Fei Xiaotong, academic influence

(责任编辑 陈 斌)

<sup>①</sup>Morgan, John W, "Fei Xiao Tong: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 Communist China" *Anthropology Today*, vol. 30, no. 6, 2014, pp. 18~21.